



學人簡介

PHILIP ALDEN KUHN

林 滿 紅*

孔復禮 (Philip Alden Kuhn, 中文譯名一為孔飛力) 教授，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及歷史與東亞語言研究所所長，亦為美國文理研究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院士。在歷史學的行政業務方面，除了擔任過芝加哥大學東亞系及東亞研究中心、美國歷史學會會刊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等要職之外，曾於1980至1986年間主持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履歷詳見附錄)。在著作與教學方面，被公認是繼費正清教授之後，引領美國的近代中國史研究走到新方向的一個重要學者 (詳見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孔教授的著作一向被讀者視為艱深難懂，但後繼者不斷地重新思索他所提出的問題。孔教授的教學一向嚴厲，但仍不斷有來自 Berkeley, Princeton, Stanford 等美國著名大學的研究生，希望跟他學習。究竟孔教授研治近代中國史的著重點為何？本期「通訊」主編王萍先生希望能在學人簡介欄介紹孔教授，筆者承蒙孔教授提供一份他的治學背景。以下先譯述這份治學背景，再從孔教授的作品中，找出與此治學背景相關連的一些著重點。

一、治學背景

孔教授原把研究歷史當做一個過渡工作。1951年他就讀哈佛大學大學部期間，非常喜歡 Clyde Kluckhohn 教授所教的心理功能人類學理論。他於是跟 Kluckhohn 教授表示想主修人類學。Kluckhohn 教授告訴他在大學部時應先主修一些較具體的學門，如歷史學或希臘羅馬時期的經典著作，到研究所時再轉讀人類學。Kluckhohn 教授本人即先讀希臘羅馬經典再轉讀人類學。在這一引導下，孔教授選讀了歷史學。過後雖沒有正式轉讀人類學，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但人類學的關懷一直留在他往後的歷史研究當中。

選讀歷史學之後，他也受到社會學家 Norman Birnbaum 及政治學家 Samuel Beer 的啟發。兩位教授都受到 Max Weber 的影響。兩位教授也引發孔教授運用社會理論了解歷史訊息的興趣。部分也是因為這兩位教授的影響，孔教授對於敘述體裁的歷史寫作，除了晚近學著欣賞之外，一直很少感到興趣。

孔教授在以上這些老師的教導之下，頗留意觀念與社會經驗的關係。Weber 的影響使他一直認為這項關係是交相運作的，而不能單純地由一方推導到另一方。也因孔教授對人類學的興趣一直濃厚，他也留意及語言與社會思想間的關連。

孔教授在大學部期間專攻歐洲歷史。一直到大學四年級時選讀日文，才接觸到東方。之後，於服兵役期間被分發到中文學校學習中文，才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而他之決定研究近代中國歷史，則是回到哈佛大學唸研究所時，受費正清教授影響下的結果。

著手研究近代中國歷史之後，孔教授與其他同行一樣都關懷一個根本問題：中國的本土文化如何與外國文化相激相盪而塑造了近代中國歷史。對一些較大的問題，如政治參與的合適範圍，知識分子與公共服務間的關係，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等等，孔教授認為近代中國的有關安排，雖然有其歷史傳承，但大多以外來的社會語彙來表達。因此，很多的爭辯是用現代的語詞在討論，但其內在結構則導源於中國本身的歷史及中國文化的內在邏輯。了解一個文化的內在結構如何在現代的情境之下表現出來，也是他這樣一位有文化人類學興趣的歷史學者一直思索的問題。

二、著作簡介

(一) 觀念與社會經驗

孔教授「太平觀念的起源」一文有關梁阿發引介的基督教義，成為太平天國反清思想依據的討論，可以例示他對觀念與社會經驗交互影響的學術興趣。

洪秀全初讀勸世良言，已在科考失敗夢過金髮皂袍老人之後，卻沒有任何感應而依然熱中科考。再度考試失敗後洪秀全重讀勸世良言，也開始引述基督教義批評社會弊端，但批評的內容與批評背後的理想與儒家學者一貫的

批評與理想是相類似的。如不孝、謀殺、賭博等皆為洪秀全與儒家學者共同批判的對象。基督教的天堂也被視為與禱渾大同篇的世界一樣的理想。

梁阿發沒有像洪秀全那麼多的儒學訓練。梁阿發對基督教教義的了解摻雜了很多傳統中國的民間信仰。他所介紹的聖經內容，不管在章節安排或強調的部分，也與原典有很大的出入。但他除了批評中國社會之外，也指出：為了解脫中國原有的罪惡，使中國人可以得救，需有「公會」這種秘密組織，採取集體行動推翻原有的政治社會。

洪秀全一直到1850年前夕才恍然於梁阿發的這個政治含意。此時洪秀全傳教的範圍是在廣西金田村一帶，這與他早年主要活動的廣東花縣附近有很大的不同。廣東花縣是個平地，當地的客家人移入較早，形成主要的族羣，也已發展出村莊組織、宗族組織，成爲該社會自我認同的對象。廣西金田村一帶是山坡地，當地的客家人是新移入的，與當地的少數民族苗、儂、僮族等雜居。1842年之後，更與僮族械鬥不休。在缺乏村莊、宗族組織的情況下，拜上帝會成爲此地客家人自我認同的對象。由於當地的客家人被當地的地方官視爲匪逆，洪秀全才深刻了解到梁阿發籌組公會以推翻原有政治社會的暗示，而以當地的客家人比附爲勸世良言所說的「選民」。太平軍擴大之後，勸世良言中得救者與不能得救者的分野已不再是廣西的客家人與否，而在於是否參與太平軍。金髮皂袍的老人此時才成爲引領中國人得救的耶和華。一個外來觀念之落實於本土社會，也因此必須與本土經驗相結合。

(二)社會網絡、社會思想、社會行動

孔教授在「晚清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中，花費更多的心力討論社會網絡、社會思想與社會行動間的關係。負責敉平太平天國的團練是以家族、村莊、市集的垂直社會網絡為組織基礎。小團多由單姓村組成，小團之上的大團或擴大團則以超越家族、村莊的市集為範圍。太平軍在擴展之後，也以家族、村莊為主要的組織基礎。

就孔教授此書 1980 年再版的新序看來，中國傳統的叛亂團體當中，根源於天地會者，其組織形式與政府武裝團體相近，都以村莊、家族為基礎。這些秘密社會雖是非法，但其文化取向卻是正統的思想。如重視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家庭倫理，如牢固的王朝觀念（即使反清復明不過是建立另外一個王朝），如朝代興替的歷史觀，如嚴密的社會階層觀念，都與官僚士紳相近。根源於白蓮教信仰的叛亂組織則較不以村莊、家族、市集的垂直網絡為

Philip Alden Kuhn

結合基礎。他們的成員多半在各村莊間水平移動，如跑江湖賣膏藥的郎中、武術師傅、戲班子、僱工、修理家中破爛用品的人、或是賣豆腐干、賣魚、賣馬的小販。白蓮教的集會所零散分佈於各村莊，只有一些宗教領袖走訪各集會所做鬆懈的連繫。白蓮教徒可以女性充當教主，男女可以一起討論教義，雖然也重視師徒關係，但教徒彼此之間較為平等，彌勒佛降世以後的極樂世界將垂永久而不復循環。這些想法就持正統思想者看來實為異端。持正統思想者多半是在村莊、市集的垂直網絡中循著由來已久的交換（市集）、學習（書院、考試）、信仰（儒、道、佛）及社會控制（法庭、軍隊、納稅義務）等體系在移動著。他們的社會思想與經常水平移動於各村莊中的人有所不同，也是社會經驗與觀念互相關連的一個例證。

兩種非法團體的武裝組織也因而有所區別。天地會系統的組織較為嚴密，白蓮教系統的組織較為鬆散。後者多半要等到英雄式教主出現後，才會採取大規模的行動。當然，以上劃分並非絕對，由往後的捻匪、紅槍會可以看到合法——正統，非法——正統，非法——異端三種團體間的交錯關係。但基本上孔教授認為，研究民變除了探討政治意圖之外，社會網絡也是了解民變的一項要素。

由中國近代的權力安排與傳統文化

太平天國的興起造就了領導團練的士紳的崛起。士紳階層在「地方自治」觀念引進中國之後，也成為地方自治的領袖。以往學者將這些現象串連起來看成是近代以來中國地方勢力的擡頭。而在孔教授看來，這一連串的發展都沒有根本解決中國政治系統當中中央與地方的曖昧關係，但每一步的發展都強化了中央的集權統治。

孔教授「民國時期的地方稅收與地方財政」一文指出，明朝末年中央用以控制地方的里甲制度式微，式微的關鍵之一在於一條鞭法將課稅對象由人頭轉為土地。原先就人頭課稅安排的糧長制度，改成以地為課稅對象之後，很多權貴借「詭寄」、「投靠」等辦法逃避稅負，而將實際的稅負落在糧長身上，糧長里長不勝負荷，整個制度因而崩弛。繼里甲制而起的地方控制體系——保甲，在太平天國亂起之時，因為本身沒有武力，也為土紳所代起。

太平天國興起以後，領導團練的地方士紳被授與徵課釐金、雜稅的權力，新政展開之後，地方士紳也可以收取各項新政費用。表面上這是行政體系對地方勢力的節節讓步。但以士紳領導的團練而論，基本上仍是「官督紳

辦」，團練的崛起反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士紳之參與課稅，也不過是使中央原來無法課取的稅收，轉為可以課取而已。

除了實際運作如此之外，孔向教授「晚清的政體論」及「民國時期地方政府」二文指出在理念方面的同方向發展。西方的「地方自治」觀念由日本間接引進中國之後，中國學者常引顧炎武郡縣與封建的討論，而就其封建部分的討論指出中國原有地方自治的思想。孔教授認為顧炎武固然批評廻避制度而提倡縣級官吏由地方人士擔任，也主張基層官吏越多越好，但顧炎武的目的是在透過一個更有效的基層行政組織強化中央的統治。馮桂芬也贊同顧炎武的主張，並建議設立副縣官輔佐縣官，以及村長堡長民選，但基本上也不立意鼓吹分權政治。黃遵憲之由日本引入「地方自治」觀念，梁啟超、孫中山、章炳麟之繼續討論地方自治也都追求擴張國權，而非伸張民權。一個原本以伸張民權為宗旨的西方觀念，所完全引入中國的，因而只是「地方自治」這麼一個西方語彙，而此語彙所指涉的內容則仍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精神。

四 心理功能人類學與中國的政治文化

由於傳統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根深蒂固，孔教授也就逐步往上追溯塑造近代中國歷史的傳統根源。孔教授的「朝代衰亡與叛亂根源」一文即在指出鴉片戰爭爆發前夕中國社會本身所起的一些變化。如士紳取代里甲、保甲而起還可溯源於嘉道年間的包稅制度。由於官吏的盤剝，曾將收稅、納稅事宜轉包士紳。又如十八世紀以來的人口增加、貨幣經濟擴大所造成的行政品質降低，行政系統中金錢政治的滲透，都已埋下了王朝衰微的種子。但由嘉慶皇帝的政治革新、魏源所持今文經學的興起，阮元對於學術的提倡等，一反以往學者之以為近代中國的改革力量完全仰賴西方，孔教授注意到了中國本身自我更新的傳統。

又因不再如以往學者之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孔教授更往上溯源，而發現乾隆時期的剪辮案體現了不少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在他剛交給哈佛出版社的這本有關剪辮案的新作中，也可以看到心理——功能人類學理論如何影響到他的歷史寫作。

乾隆三十三年(1768)，很多道士、乞丐、泥水匠被指控偷偷剪斷別人辮子而奪走那人的魂魄。此種案件蔓延江南乃至北方數省。案子審理期間長達十個月左右，很多被控者在逼供過程中冤死。孔教授由皇帝、官僚、百姓三者心理恐懼的湊合來勾劃此一案件之所由起。

就百姓而言，他們對社會中新增加的許多流民感到不安。乾隆年間大量增加的人口造就了許多流民。他們或是乞丐，或是變相的乞丐——道士，或是與能够呼風喚雨的道士相似而可以左右風水的泥水匠。這些人對本地人而言，既非同鄉，又非同族；對他們的求助委實不願意伸出援手，但這又與社會有無相通的傳統道德相衝突，而增加本地人的心理惶恐。

清乾隆朝的皇帝官僚關係，說是專制統治，又有很多方面皇帝無法控制。官吏的上下敷衍早已使皇帝心中忐忑。漢人文化的中心——江南，聽說出了剪辮的案子。辮子是滿族統治漢族的文化象徵。這樣一樁叛逆行爲竟然沒有大臣上報，更使皇帝氣極敗壞。皇帝由情報系統得知這個消息的事很快傳到地方官吏的耳中。儘管地方官吏頗習慣於敷衍，但是皇威依然顯赫，如果不認真查辦此事，可能危及身家。在此情況下，那些平常令村民感到不安的道士、乞丐、泥水匠成爲被指控的對象。即使他們不承認剪過別人辮子，官吏也要他們承認。

在層層起訴之後，到了軍機處，才有軍機大臣直言急諫指出這是一起冤獄。雖然至高無上的皇權因此受到了制衡，但沒有一個制衡制度的保障，這種直臣急諫的制衡力量總是可遇而不可求。在一個沒有法治而又資源匱乏的社會，誣控他人常被用爲改善個人地位的社會資源。人與人之間如何因此而心懷戒懼，也是乾隆剪辮案結案之後中國人常有的心理陰影。

五 深入史料探索文化意含

以上乾隆剪辮案的分析方式，將會使讀者連想到西方學者有關西方近古時期頗爲盛行的巫婆審判的研究。在該項研究中，西方學者也頗留意及審判者與指控者想法的一拍一合。孔教授這一著作則在審判者的層次更細分出皇帝與官僚之間的關係。而不容易的是，孔教授是一個人獨自在處理清代中國的這一題材，西方學者則有一羣人共同研究，孔教授是在他所不習慣的語文中爬梳資料從事這項研究，而西方學者則使用其所較習慣的語文寫成的資料。爲了瞭解剪辮案中指控者的心靈，孔教授費了極大心力閱讀故宮所留下該案的口供，爲了掌握皇帝與官僚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孔教授對於相關文件的內容與收發日期做了極爲細密的考訂。孔教授的其他作品也都呈現出他深入史料的歷程。如爲了研究團練的社會網絡，孔教授曾深入研析江忠源、胡林翼、曾國藩、劉于溝等人的文集及相關地方志。又如研究洪秀全思想的轉折，孔教授則曾於洪秀全的詩文加以字字剖析。一如人類學者的田野工

作，孔教授一定要由歷史人物自己的話語與行為，體察其背後的意念。

也因為對歷史人物所留存資料的重視，孔教授曾編，也正在編清代資料。已出版的「清代資料」一書是以鍾人杰所倡導的民變為主軸，網羅與此事件有關的上諭、奏摺、方志、口供、文集各項資料。使用者可由此接觸清代幾種主要史料的形式。在此之外，孔教授最感興趣的仍在透過這一事件體現社會網絡與社會行動間的關連。

一面要對歷史人物所留下的話語逐字逐句熟讀，一面又要與全面歷史進程及社會理論關連起來加以深思，這是孔教授對他自己也是對他的學生嚴厲之所在。在這樣一個努力過程中，雖然已看到一個更從中國出發，更能從事社會結構與文化傳承省思的研究，但畢竟這也是一個頗為困難的研究方向，而有待更多心力把它推展到更充實的階段。

附錄：Philip A. Kuhn 教授履歷及著作目錄

EDUCATION

Harvard College	A. B.	1954
Georgetown University	A. M.	1959
Harvard University	Ph. D.	1964

TEACHING POSI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structor to Professor	1963-78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Professor	1978--

ADMINISTRATIVE AND PROFESSIONAL POSITIONS

Director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1-74
Chairman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5-77

Philip Alden Kuhn

Board of Editor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5-78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SSRC/ACLS	1971-76
Director,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1980-86
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1986--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6-87

FELLOWSHIPS AND HONORS

Ford Foundation Foreign Area Fellow	1958-62
Fulbright Research Fellow, Kyoto University	1965-66
ACLS Fello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1970-71
Guggenheim Fellow	1974-75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 Fellow	1984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Fellow	1977--

PRINCIPAL PUBLICATIONS

1. Books
 -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Rev. Ed. 1980.
 - *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Vol. I: Reading Documents: The 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 Harvard University,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With John K. Fairbank).
2. Articles
 - "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7 (1967)

- 218-255.
-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F. Wakeman and C.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257-298.
- "Origins of the Taiping Vision: 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Rebell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 3 (July, 1977) 350-366.
-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1978) (with Susan M. Jones) 107-162.
-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1978) 264-317.
- "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 3 (1978-9) 100-136.
- "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 *Select Papers*, No. 4 (1979-80) 1-18.
- "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James L. Watson, ed.,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28.
-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1986) 329-360.
- "Political Crime and Bureaucratic Monarchy: a Chinese Case of 1768," *Late Imperial China* 8, 1 (June, 1987) 80-104.
3. Work In Progress
-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under contract t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nal manuscript delivered in June, 1989).
- 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Vol. II: Using Archives* (Harvard University,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ith Beatrice S. Bartlett;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1989).

Hellmut Wilhelm, Sinologue

Michael Gasster*

Asked recently what he considered his major scholarly work, Hellmut Wilhelm unhesitatingly singled out his studies of the *I Ching*. ① When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some of his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gave a like answer, while others stressed his work in Chinese literature or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Ch'ing thought. To the extent that any consensus emerged it was that Hellmut Wilhelm is a Sinologue. One hastens to acknowledge that this noble old term has become a bit tarnished and bruised over the years. If, however, it were to be reconsidered in the fresh light of Hellmut Wilhelm's entire scholarly work, the term could earn new meaning and respect.

I suspect that for many of us Professor Wilhelm has been an exemplar of Sinology. In my own case, for many years after I first became his student in 1955 I regarded him as a quintessential Sinologue. What will be suggested here, however, is that even the capacious bounds of Sinology's noblest traditions are not quite wide enough to accommodate professor Wilhelm's work. Properly understood, Hellmut Wilhelm's scholarship represents a kind of meta-Sinology that suits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time when China has come to global prominence and when the study of China must perforce be integrated with the study of all

* 美國新澤西州Rutgers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

The author wishes to thank all those friend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of Hellmut Wilhelm who offered comments on a first draft of this essay. I a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Professors Howard L. Goodman and F. W. Mote for their valuable suggestions. Most of all I thank Erica and Hellmut Wilhelm for their patient assistance in providing me with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indeed, for more than I can express.

① Specifically, *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even Eranos Lecture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His other publications on the *I Ching* are noted below.